

推进全面二孩,需要更丰富政策储备

本报评论员
高路



人口政策最不容易在短期内见效,往往错误在不知不觉中埋下,等到发现时已经为时已晚。



全面二孩政策落地满一年,这项牵动千家万户的政策实施的效果如何,今后将如何演变,一直是社会密切跟踪的热点。

1月22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通报了相关情况。据杨文庄介绍,2016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抽样调查推算数据,全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根据国家卫计委统计数据,2016年全年住院分娩活产数为1846万人。

卫计委说新出生人口在预期之内。有些专家则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个数字低于预期。光从数据看,这已经是2000年以来的最高。当然,任何预测都不可能百分百正确,但不同预测版本之间巨大的差异,以及预测数字与最终实际生育的孩子数量之间的差距都表明中国的人口形势和生育观念转变之复杂。

能生是一回事,敢不敢生,愿不愿生是另外一回事。有一个数据颇能说明全面二孩政策冲击的剧烈程度,在去年出生的新生儿中,

有45%的比例是二孩,比实施前的2013年的30%左右高出十几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二孩政策的推出,新生儿的数量可能会大幅减少,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庞大的人口基数的国家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新的生育观念对人口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情况复杂意味着政策也得多元化。一方面,预测可能不准,不能真实地反映情况,社会需要给“意外”留足政策空间。

另一方面,杨文庄也指出,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各国鼓励生育政策实施的效果一般有5年到10年的滞后,也就是说一项政策哪怕马上开始实施,也需要5到10年才能看到效果,一旦犯错,纠错的成本是相当高的。

人口政策最不容易在短期内见效,往往错误在不知不觉中埋下,等到发现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例子不能不引起重视。社会最应该避免的是明明情况已经分明,却应

对不力;明明迫在眉睫,却还在争议该不该以及如何制定政策的事。

这就要求将工作做在前头。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更多维度的评测体系,准备更多的应对方案。形势严峻有形势严峻的做法,形势乐观有形势乐观的应对之策,如果放开还不足以扭转不利的趋势,那么政策就该及时加码,就该及时在教育、税收、就业、社会福利等方面做出倾斜。尤其当情况复杂,一些数字可能预测不够准确时,更需要政策的储备。一旦达到启用的标准,立刻就能实施。

在诸多争议中,有一种共识是大家都能接受的,那就是中国的生育形势并不乐观,会上传递出“国务院40多个部门已明确分工,推进全面二孩政策落实”的信号。从严格的计划生育过渡到推进二孩政策的落实,如此剧烈的转变,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人口政策其实已经落后于现实情况。

踢软球打软排,怎能期望孩子变刚强

本报评论员
陈进红



如果以安全等理由牺牲孩子的运动乐趣进而影响孩子体质,岂不是因噎废食。一个讨论了24年的老话题,是否还要继续下去。



1993年,青少年问题专家孙云晓的一篇关于中日少年的文章——《夏令营中的较量》,引发了中国体育教育的大讨论:中国孩子表现不如日本孩子顽强,不仅有观念意志方面的原因,更有体能差异的原因,只是后者未引起足够的警觉。

24年过去了,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仍是常谈常新。近日,一篇名为《别让学生踢“软球”》的文章,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报道称,为保护学生不受伤害,部分学校用上了软式足球、软式排球等器具。更有一些体育老师因担心学生出现意外伤害,不敢让学生上像“跳山羊”、单双杠等传统项目,致使这些项目正悄悄退出中小学体育课堂。

时至今日,幼儿以及青少年体育教育似乎仍走不出困境。体育教育,也是一种教育,远不止运动那么简单。同时,体育教育不能等同于“运动”,作为一种教育,“体育”最重要的是培养运动精神,而不断超越自己,就是一种运动精神。

虽然“软排”和“硬排”规格一样,“软球”

和“硬球”似乎一样踢,但我们都知道软硬的触感不同,身体所做出的自然防御保护反应也不同,很多体育老师对于这种教具并不认可,不少学生也觉得“没意思”。相比之下,一些发达国家的体育课程多是从实际领域出发,在户外急救、野外生存、生命教育、健身强体之间寻求平衡。

事实上,更多的运动经验有助于减少危险。儿童能从活动中获得处理危险的知识,反之,孩子如果缺乏与年龄相应的运动经验,那么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就会大得多。而现实中,有些家长过于谨慎,见孩子受点儿伤就要跟学校讨说法。来自家长的压力是一方面原因,而对学校来说,相关法规界定不明晰、保险赔付不到位,是缺失的重要环节。

体育课上的意外伤害事件,令学校陷入难缠的纷争中。学校管理、法律归责和社会救济等能在多大程度缓解家长顾虑,为体育教学保驾护航?2002年国家发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七条对此有明确规定。但具体到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还是承担

“过错推定责任”,就有了分歧。二者的区别在于由谁承担举证责任。

在具体司法实践中,采取哪种归责原则,就决定了谁来承担举证责任,而这往往左右着案子的输赢。因此,如果对学校实行过错推定责任原则,那么学校可能为了自我保护而减少各种可能承担责任的体育活动。

学校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为了避免意外,做出了减少孩子户外体育活动或禁止参与一些运动项目的规定。双杠从校园里消失了,运动会需要学生签“免责书”,对抗性强的球类活动也被无情“埋葬”……

如果以安全等理由牺牲孩子的运动乐趣进而影响孩子体质,岂不是因噎废食。一个讨论了24年的老话题,是否还要继续下去。韩国的做法或许可以借鉴,只要是学校尽到了防范的责任,家长就不会找学校的麻烦,而且学生都有保险,受伤后的医疗费用都由保险公司负承担,学校的压力不会很大。对于双方均无过错的意外事故,引入赔偿基金或保险制度等社会救济或许是更合理的做法。

黑救护车肆虐,谁之过

本报评论员
项向荣



黑救护车屡禁不绝的背后,还是救护车的供给不足的问题,制止黑救护车的肆虐,最重要的途径还是要增加正规救护车的供给。



新京报最近对北京一些大医院活跃着的众多黑救护车展开调查,发现这些黑救护车多为私人所有,自称可为患者提供转院、场站接送、急救等服务,但设备简陋,救护不专业,而且经常半路漫天要价。

救护车是关系着人民生命的特种车辆,但有如此之多的“黑救护”在路上行驶,甚至通过挂靠顶着正规的帽子,让人不得不为之震惊。这些黑救护车设备简陋,救护不专业,如何能保证车上病人的安危?而且,“黑救护车”并非只在个别城市中存在,甚至可能已经成为全国性的普遍问题,从这几年屡见报端的新闻披露即可见一斑。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社会对于救护车的需求正在日渐增加,中国人口老龄化也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救护需求。同时,我国发生交通事故致死伤的比例也大大高于国外,这些都在争夺着救护车这块蛋糕。

然而,在我国,救护车这块蛋糕到底大不大呢?按照我们的国家标准,要求每5万人应当配备一辆救护车。但是,德国是每1万人配备一辆,我国的台湾地区每2.8万人配备一辆,香港每2.5万人配备一辆。应当说,我们的国标原本水准就不高。但即便是5万人一辆的国标,达标的也不是很多,只有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达到。

北京是3万人配备一辆,这一标准已是全国最高水平。但是北京等一线城市,却是医疗资源过度集中的地方,每年都有很多非本地的患者来就医,他们很多是重病患者,对救护车的需求特别旺盛,所以北京3万人一辆的救护车配备,只能算是杯水车薪了。

因此,黑救护车屡禁不绝的背后,还是救护车的供给不足的问题,制止黑救护车的肆虐,最重要的途径还是要增加正规救护车的供给。当然,增加一辆救护车,并非仅仅购买一辆那么简单,它需要人员的配备磨合,车载

医疗设施的完善:底层数据、操作手段、整体功能融合都要跟上,需要假以时日。

在增加绝对量的同时,也可在医疗系统内部挖掘潜力。记者调查中发现的大量外地牌照救护车,经查询均归属一些外地县市级医院,因为医疗资源、病患群体都流向一二线城市,它们有时被闲置了,所以也就被人利用成“黑救护车”了。所以如何在国家层面建立打破行政区域的、地区间有效协调的救护车共享机制,也是增加救护车有效供给的方法。

同时还要看到,有些患者对救护车的需求,仅是长途转运护理并非急救中心的主要业务,这一块技术要求不太高,可以委托第三方处理。比如2016年夏天美国华盛顿州,因承担院前急救任务的救护车太繁忙,就计划让出租车或是Uber来分摊一部分不太紧急的需求,这样也可以缓解对救护车的需求,间接做大这块蛋糕,只需对第三方做简单培训即可。